



我国蒙古语族语言研究概况

陈乃雄

我国蒙古语族语言包括蒙古语、达斡尔语、东乡语、土族语、保安语、东部裕固语。

据1982年统计,我国蒙古族人口约341.17万,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使用本民族语言作为主要交际工具的占蒙古族人口的82%;达斡尔族人口约9.40万,东乡族人口约27.94万,他们分别使用着各自的语言;土族人口约15.94万,除居住在大通县的转用了汉语,居住在同仁县的使用的是保安语和五屯语外,绝大多数使用着土族语;保安语的使用者是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干河滩、大墩、高李家等村的保安族和青海省同仁县年都乎、郭麻日、尕洒日、保安下庄四个村子的土族,共约一万人;东部裕固语的使用者是居住在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东部康乐区和皇城区北滩、东滩等地的裕固族,约三千余人,居住在其他地区的裕固人则分别使用属于突厥语族的西部裕固语和汉语。

在我国,蒙古语族诸语言中,对蒙古语的研究起步较早。解放前,北京大学即设有教学蒙古语文的专业。1947年在齐齐哈尔内蒙古军政学院建立过蒙古语文研究室。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蒙古语文工作。1953年召开了第一次蒙文工作会议。蒙古语文研究会宣布成立。

五十年代中期,我国的蒙古语文研究进入空前繁荣的时期。1955年和1956年先后两次组织了全国范围的蒙古语族语言和方言普查。调查队的足迹遍布内蒙古自治区和新疆、甘肃、青海、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等省、自治区有蒙古、达斡尔、土族、保安、东乡、裕固各族人民聚居的地方。参加两次调查的人员累计一百二十余人,调查点六十多个。在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具有我国自己的特色的蒙古语族语言科研工作全面展开,就蒙古语和蒙古语族其他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以及方言土语的划分、蒙古语新术语的制定、文字改革的设想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十年动乱,科研活动几乎完全停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蒙古语科研工作才逐步得到恢复,从1978到1987短短十年间就发表了近千篇文章,还出版了许多专著。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了过去。

语法专著方面,继六十年代内蒙古大学编著的《现代蒙古语》之后,又有松儒布的《蒙古语语法知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6)、宝音、赛音的《蒙古语语法基础知识简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77)、布和吉日嘎拉、恩和的《蒙语语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出版。清格尔泰的《现代蒙语语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是一部学术性语法著作,那森巴雅尔、哈斯额尔敦、斯琴、朝克图、达瓦达格巴、图力更、那仁巴图合编的《现代蒙古语》(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2)是一本高等院校蒙古语专业的语法教材。

在语音方面,《蒙古语言文学》发表了昂儒布的《蒙古语语音发展史概述》(1981.3)、天峰的《论蒙古语长元音的形成和发展》(1983.3),《民族语文》发表了清格尔泰的《蒙古语塞音q, k的历史演变》(1985.3)、包力高的《蒙古书面语元音间未脱落的辅音γ~g》(1985.1)等,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对蒙古语语音进行探索,填补了我国过去在

这方面的空白。道布的《蒙古语口语中的词首辅音弱化现象》，综合分析各地的口语材料，用两个公式概括了词首辅音弱化的全部条件（《民族语文》1981年1期）。孙竹在同期《民族语文》发表的《现代蒙古语的弱化元音》，否定了传统的观点，指出弱化元音不是各种短元音的变体，而是中性的特定音位，最后总结出给蒙文注口语读音时弱化元音出现的九条规则，解决了一大疑难。白音朝克图等发表在内蒙古大学学报，金刚等发表在《蒙古语文》上的《现代蒙古语语音系统》、《蒙古语语音结构》等文章则着重于现代蒙古语语音的研究，可以看作是对五、六十年代成果《长元音和复元音》（确精扎布）、《关于蒙语辅音》（清格尔泰、确精扎布）、《关于蒙古语基本元音》（清格尔泰、新特克）、《蒙语语音系统》（清格尔泰）等的补充。容舟在《民族语文》1980年第1期，宝力巴苏日乐在《蒙古语文》1985年第1期分别提到了过去不为人们所注意的蒙古语吸气音和送气辅音 n 的有趣现象。满达夫的《蒙古语音五行学说分类法》介绍了十四世纪学者搠思吉斡节尔和十八世纪学者丹赞达格巴等如何使用五行学说研究蒙古语语音以及这种方法对后来的语音研究产生的影响，对于帮助人们了解和借鉴前人的经验和教训提供了方便。

元音和谐是蒙古语一种重要的语音现象，它向来是学者们所关注和极感兴趣的问题。清格尔泰在《关于元音和谐律》（《中国语言学报》创刊号）中指出传统蒙古语法所说的阴性元音和阳性元音的区分在内蒙古察哈尔土语里实际上是元音松紧的对立，在卫拉特方言里是由舌位的前后不同决定的，在科尔沁土语里则是由舌位的高低不同决定的。文章分析了元音唇形和谐的序列性及依附元音的性质。通过对于阿尔泰语系和芬兰——乌戈尔语系一些语言的比较指出：元音和谐律是关于词内部前后音节里的元音之间的求同性、限制性、序列性、制约性的规律，是一个词里元音之间的调和及制约关系的规律。喻世长在《民族语文》1981年第2期上发表的《元音和谐中的三足鼎立现象》也是讨论元音和谐的理论的。作者把元音和谐归纳为一峰独特、两水分流、三足鼎立、四平八稳这样四种现象，说明每一种语言或方言的元音和谐都有一定的复杂性。单独描写每一种口语的元音和谐是语言的断代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属于语音的侧面，但和词汇、语法都有联系。同时，元音和谐也是语言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比较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从讨论的结果，作者引出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语言的互相影响会不会是元音和谐表现形式发生变化的一个原因？元音和谐的三足鼎立现象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语言互相影响会不会起一种引导和促进的作用？道布在1984年第2期《民族语文》发表的《蒙古语的元音和谐与元音音位对立的中和》从音系学的原理出发，把音位理论的基本原则用到比音段音位更高的层次上，考察蒙古语元音和谐的区别性特征是二分的对立体；以紧、松对立为基础的两套元音音位在多音节词的后续音节里失去对立的性质，就产生了音位对立的中和。对立中和的理论，不仅适用于元音系统，而且也适用于辅音系统，颇具启发性，受到好评。

在蒙古语词法研究方面，首先碰到的就是划分词类的问题。确精扎布在六十年代所撰《关于蒙古语词类》一文，就蒙古语的词类划分标准提出了相当详细的意见。尽管如此，人们在具体划分词类时还是不尽相同。有的研究者对于是否有必要从名词和副词里区分出时位词和摹拟词来表示怀疑。近年来发表有关名词格、数等范畴的论文的有哈斯巴特尔、王鹏林、呼和巴尔、达瓦达格巴、吉如木图、哈斯巴干、吉仁尼格、那顺乌日图、宝音德力格尔、双胡尔、托娅等；发表有关动词的不同类别、形态等的论文的有贾晞儒、特图克、森格、石新安、倪申源、侯万庄、查干呼、孟和那钦、宾巴仓、敖特横等；发表有关代词的论文的

有那德木德、白雪峰等；发表有关形容词的论文的有呼日勒巴特尔等；发表有关量词的论文的有斯钦毕力格等；发表有关副词的论文的有恩和等；发表有关形态学的论文的有昂儒布、斯钦等。焦其戴·吉仁尼格的《古代蒙古语语法中语音屈折的痕迹》（《蒙古语言文学》，1983. 4），以《蒙古秘史》语言中分别表示单、复数不同人称的代词 bi-ba, mi-ma (min-man)；tji-ta; i-a(in-an)为例，说明古蒙语中存在着语音屈折的现象。

过去对于蒙古语语法的研究，侧重在词法方面，句法研究一直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近年来这方面有了加强。清格尔泰在他的《现代蒙语语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一书中对于句法结构分析提出了一些新的方法，即传统语法和直接成分分析法的结合，也就是句子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的结合。这些方法后来又集中反映在他的《关于句法结构分析——根据蒙古语材料》（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 2）中。道布在《蒙古语句子结构分析》（《民族语文》，1979，2）一文中把蒙古语的复句分为并列复句、偏正复句、包孕复句、引语复句四种基本类型，把蒙古语的句子成分分为中心成分和扩展成分两大类。中心成分是谓语，扩展成分是状语、补语、主语。这就打破了关于把句子成分划分为主要成分、次要成分两大类，以主语和谓语为主要成分的传统观念，认为“蒙古语的句子一般是以谓语为支撑点建立起来的。谓语是蒙古语句子中不可缺少的成分。谓语作为句子的结构中心，决定整个句型。”作者把句子成分的结构分为修饰结构、连动结构、并列结构、复指结构和复合结构，认为“句子内部的各种结构关系并不都处在相同的平面上，因此，分析结构关系复杂的句子就要弄清楚结构关系的层次。”此外，特图克的《蒙古语句子结构问题》（《蒙古语言文学》，1986，6）、季荣的《句法研究》（内蒙古师大学报，1984，3）、《论不完全句》（《蒙古语文》，1986，1）、《关于词组和词的组舍》（《蒙古语言文学》，1985，1），贾晞儒的《蒙古语并列结构的语义关系》（《民族语文》，1983，4），恩和的《蒙古语词组概述》（《蒙古语言文学》，1982，1）以及讨论具体句子成分的意义和作用的文章诸如达瓦达格巴的《论蒙古语宾语的几个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1985，3）、《论蒙古语的“插入定语”》（《蒙古语文》，1981，6），德力格尔玛的《浅谈现代蒙古语状语》（《蒙古语文》，1986，8），倪申源的《关于蒙古语的定语从句》（《东方研究论文集》，1983），侯万庄的《试论蒙古语句子的补语》（《蒙古语文》，1985，3）、《蒙古语直接宾语和状语的定义及词义分类法》（《蒙古语文》，1985，5）等，都为充实蒙古语句法的研究内容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年来出版了许多各种类型的词书，既有蒙古语解释词典、蒙汉、汉蒙对照词典，也有成语词典、正音正字词典，还有某些学科的专业词典和名词术语词典等。对于词汇学和词典学的研究也日益深入。新特克写过《蒙古语词汇研究的历史概况》（内蒙古大学学报，1980，1）、《蒙古语词典学起源》（《蒙古语言文学》，1986，3），仁赛玛写过《蒙古语词书及其种类》（《蒙古语文》，1983，6）、《论13—17世纪初的几部蒙文辞典》（《蒙古语言文学》，1985，2）、《18—20世纪中叶蒙古词书研究》（《蒙古语言文学》，1986，3），旺楚克写过《蒙汉对照词典初探》（《蒙古语文》，1987，2）、《论近几年出版的蒙古语词典》（内蒙古师大学报，1985，4），官其格苏荣写过《词书浅谈》（《蒙古语文》，1980，5）等。其他，像那顺巴特尔、斯钦巴特尔、满达勒图、阿木尔吉日嘎拉、宝音巴图、巴特尔等都有文章发表。昂儒布的《古代蒙古语的基本词汇和构词规律》（《蒙古语言文学》，1982，2）从《蒙古秘史》里摘录了一些当时使用的

名词和数词，罗列了69种构词附加成分和几种类型的复合词，向读者们介绍了中世纪蒙古语基本词汇和构词规律的一斑。陈乃雄关于蒙文同形词的研究，哲、赛音额尔敦、巴图乌力吉关于复合词的研究，图力更、巴特尔、普日布、斯琴高娃关于同义词的研究，贺连喜关于多义词的研究，贾晞儒、包志宏、孟根关于反义词的研究，有的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有的充实了这方面的内容。近年来，芒·牧林、那顺巴特尔、倪申源、敖特横等对于借词问题的研究和拉西东日布、吴俊峰等对于新词术语问题的研究，给旧问题注入了新的活力。

蒙古语构词法研究近年来受到更多的重视，在有些语法著作里被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单另论述。这方面的论文也发表了不少。例如诺尔金的《构词法在词汇丰富发展中的地位》（《蒙古语言文学》，1981，1）、《蒙古语构词附加成分举例》（《蒙古语文》，1981，5），新特克的《现代蒙古语构词法问题探索》（《蒙古语言文学》，1981，1），葆录的《蒙语构词法研究参考》（《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1—2）、《关于蒙古语的某些构词后缀》（《民族语文》，1981，3），斯钦巴特尔的《关于蒙古语构词法的历史演变》（《蒙古语文》，1985，4），格日勒图的《蒙古语构词附加成分的体系》（《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3），赛熙雅勒的《蒙古语名词中同构词附加成分有关的问题》（《蒙古语文》，1981，3），斯钦朝克图的《出于语音音变的构词问题》（《内蒙古师院学报》，1978，1），巴特尔的《试论蒙古语元音 i 的构词作用》（《内蒙古师大学报》，1985，4）等。

学者们对蒙古语方言土语的研究，自从五十年代两次大规模的调查之后，一直没有中断。1956至1958年间，《蒙古语文》先后刊登了清格尔泰的《中国境内蒙古语族语言及蒙古语方言概况》、哈斯额尔敦的《注意方言土语的研究》、确精扎布的《谈〈关于蒙古族语言和某些方言〉》。接着，迄至1966年为止，又有《蒙古语巴林土语的语音和词法》（清格尔泰）、《鄂尔多斯土语特点》（哈斯额尔敦）、《卫拉特音位》（确精扎布）、《论巴林土语》（斯钦巴特尔）、《巴林土语的复辅音和长辅音》（扎拉其夫）、《巴林察哈尔土语的前化元音》（白音朝克图）等一系列研究特定方言土语的论文发表。近十年来就察哈尔土语发表文章的有孙竹、图力更、那德木德、武达、诺尔金、丹森、敖其等人。就巴林土语发表过文章的有道布等人。就苏尼特土语发表过文章的有哈达础鲁等人。就乌拉特土语发表过文章的有包·吉仁尼格、巴图赛罕等人。孙竹的《察哈尔方音研究》在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指出锡林郭勒、察哈尔语音中元音有松紧对立的性质。文章介绍了国外有代表性的蒙古语研究著作对于四个圆唇元音的众说纷纭的看法之后指出， ɔ ， u ， o ， u 都属于后元音，重要的是 ɔ ， u 是紧元音，也就是说在发 ɔ ， u 的时候可以明显地感到喉头肌肉特别紧张，舌根用力，音色是清楚、响亮的，而发 o ， u 的时候则感觉不到喉头紧缩，舌根用力，音色也没有 ɔ ， u 那样响亮。在舌位高低方面，紧元音比之有关的松元音舌位低而后，如 ɔ 比 o ， u 比 u 舌位是低一些，后一些的。 a ， i ， ɛ ， æ 四个短元音同样是紧元音。出现在多音节词的非第一音节的 a ， o 是松元音、弱化元音。 i ， u ， ɛ ， æ 四个短元音则从不出现在非第一音节。孙竹六十年代初首先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现代蒙古语规范问题》，探讨语音、词汇、语法必须规范的问题和以什么原则进行规范。1985年出版的孙竹的《蒙古语文集》中，他从语言学理论上提出进行语音规范的各项原则，具有较高的科学性，是可行的。

就科尔沁土语发表过文章的有确精扎布、孙竹、白音朝克图、查干哈达、涛高、乌力吉等人。就喀喇沁土语发表过文章的有诺力玛扎布等人。就杜尔伯特土语发表过文章的有波·少布、包祥林等人。就扎赉特土语发表过文章的有那森巴雅尔等人。确精扎布的《科尔沁土

语元音音位的一些特点》在长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蒙古语科尔沁土语元音的一系列现象提出了新颖的解释。其中对非第一音节短元音性质的分析尤为深入。区分元音的阴阳性时第一次提出了元音在第一音节和非第一音节可属于不同的类别的理论。对非第一音节 ϵ 、 u 的性质作了详细的分析，首先提出这两个元音是中性元音的观点。该文在蒙古语方音研究方法方面有所突破。那森巴雅尔的《扎赉特土语的几个前元音》研讨了扎赉特土语语音系统内的 ϵ 、 θ 、 y 、 ϵ 、 θ 、 y 等六个元音，认为这六个元音在扎赉特土语里都是独立的音位，前三者和后三者分别处在各自演变史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这个见解不但对扎赉特土语语音系统的深入研究，而且对整个蒙古语语音的比较研究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就鄂尔多斯土语发表过文章的有哈斯额尔敦、额尔敦孟克、森格、吉如木图、巴图吉日嘎拉、伊·索约尔图、宝·色仍诺尔布等人。就阿拉善土语发表过文章的有斯钦毕力格、贾拉森、格日勒图、巴图格日勒、加罕岱等人。就额济纳土尔扈特土语发表过文章的有却丹达尔等人。哈斯额尔敦的《蒙古语鄂尔多斯方言语音特点》介绍了鄂尔多斯土语短元音、长元音、二合元音、元音和谐律、重音和弱化元音、辅音等各种语音现象的特点。他指出：“鄂尔多斯方言中元音的唇状和谐律不严格，即在第一个音节中有非圆唇元音的词的后音节中可以遇到圆唇元音。这种现象与蒙古语许多方言不同，而与书面语言基本一致。”“在鄂尔多斯方言中，第一个音节之后的短元音基本上都保存着，发音也比较清晰。”加罕岱是一个年轻的农村业余语文工作者，她写的《阿拉善土语中所见古语词初探》讨论了阿拉善土语里迄今使用着的古语词的情况。作者把这些词拿来同其他土语作了比较，认为阿拉善土语几百年来受到内蒙古方言的巨大影响，而它的一部分语词却存在于新疆的和硕特土尔扈特土语之中。这些语词同时又见于古代蒙古文献。这表明阿拉善蒙古人很好地保存了自己的古老的语言。

就巴尔虎—布里亚特方言发表过文章的有包祥、武达、吉仁尼格等人。就卫拉特方言发表过文章的有斌巴、伦图、宝乐干等人。就青海境内的蒙古语方言土语发表过文章的有贾唏儒、察干哈达、索南木、布林巴雅尔、乌云其其格、群克加尔、曲日其木、才仁巴力、尖加、张玉春等人。贾唏儒的《海西蒙古语的特点》根据实地调查材料对居住在青海省海西州的蒙古族语言中的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特点作了概括的介绍。文末特别提到了藏语对于海西蒙古语的影响，认为“藏语对海西蒙古语的影响，不言而喻，主要是指藏语的安多方言。但是当我们将这些借词同藏语比较时就可以看出：凡是被海西蒙古语吸收过来的，都在一定程度上‘蒙古化’了，即语音结构、元音和辅音的变化，都是按着蒙古语的语音结构规则和元音和谐规则进行的”。

此外，哈斯额尔敦、松儒布、斯钦巴特尔、普日布等还发表了一些方言土语语音比较研究方面的成果：《蒙古书面语和方言土语的短元音、辅音比较》（《蒙古语言文学》，1981，1；1984，3），《阿拉善土语音位与标准音音位对照》（《蒙古语文》，1985，2），《察哈尔标准音和巴林土语语音比较》（《蒙古语言文学》，1982，1），《新巴尔虎土语和书面语的比较》（中国蒙古语文学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

蒙古语的方言土语虽然调查研究得不少，但是学者们对我国蒙古语方言划分问题却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孙竹、图力更等主张划分为东部（内蒙古）和西部（卫拉特）两个方言；清格尔泰、道布等主张划分为中部（内蒙古）、西部（卫拉特）和东北部（巴尔虎—布里亚特）三个方言；满达夫、吴俊峰等主张划分为东北部、东部、中部、西部四个方言；哈斯

额尔敦、那仁巴图主张划分为东北部、东部、中部、南部、西部五个方言。关于选择基础方言标准音问题，除了一致认为不宜以卫拉特方言和巴尔虎——布里亚特方言为基础方言外，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意见也未能统一。有些学者主张以互为补充的两个土语的语音为标准音，有些学者主张以单一的土语的语音为标准音。经过反复讨论，八省区蒙古语文工作协作小组于1979年作出了关于确定以中部方言为我国蒙古语的基础方言，以内蒙古正蓝旗为代表的察哈尔土语语音为标准音的决定。

修辞学是语法学的合理继续和补充部分。随着蒙古语语法研究的深入和完善，蒙古语修辞学的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得到发展。那仁巴图围绕修辞学的体系、地位、修辞手段、修辞环境、语言风格，索约尔图就修辞的内容和形式、修辞法在语言学中的作用，朋斯克就修辞学的实践性、修辞格及其范围、修辞的三性原则等问题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特格希都楞的《关于修辞法的几个问题》（《蒙古语文》，1985，2），特图克的《浅论蒙古语修辞法》（《蒙古语文》，1985，4—5），贾晞儒的《试谈蒙古语言风格及其它》（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2，2），艾力布扎木苏的《蒙语修辞试谈》（甘肃人民出版社，1977）等，在建立和充实蒙古语修辞学这门年轻的分支学科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翻译在思想交流和语文工作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对于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的研究也愈来愈被强调。1978年，曾经召开过一次八省区蒙文翻译科学讨论会。会上提出的论文有二十九篇。会议的总结报告中特别对其中的八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苏赫的《试论活译》介绍了政治论著翻译中的宝贵经验，仁钦嘎瓦的《蒙古翻译史概述》唤起了翻译工作者继承和发扬翻译优秀传统的热情，艾力布的《关于自然科学名词术语》是几十年来数理化翻译中处理名词术语方法的总结，吉格木德的《关于生物名词术语》是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吸收群众口语中的养分，用蒙古语解决命名问题的宝贵尝试，陈乃雄的《论蒙译汉》是用汉语翻译蒙文文学作品的方法和经验的总汇，普仍来的《翻译出版（红楼梦）过程中遇到的某些翻译问题》传授了将汉文文学作品译成蒙文的技巧，宝音图的《关于公文翻译》相当全面地总结了公文翻译的经验，扎木苏的《我们的翻译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提出了颇有价值的意见。进入八十年代之后，关于翻译问题的探讨更加深入。以翻译理论为主题的有贺其业勒图的《论蒙古语翻译理论的历史传统》（《蒙古语言文学》，1983，2）、巴雅斯忽楞的《浅论翻译与思维的关系》（《蒙古语文》，1986，2）、特格希都楞的《关于翻译的特点、性质和标准》（《蒙古语文》，1985，5）、达木林的《关于翻译修养问题》（《蒙古语文》，1984，6）等。以翻译实践和技巧为主题的有杨才铭的《翻译的实践过程》（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5，1）、赛音额尔敦的《汉译蒙的两个基本过程》（《蒙古语文》，1983，2）、照日格图的《在翻译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蒙古语文》，1984，1）、贾晞儒的《试谈句子的翻译——汉译蒙札记》（《民族语文》，1984，1）等。此外，还有阿拉坦巴干的专著《虚词译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等。宝音达赖、布林、斯钦、仁钦、道尔吉强等关于政论、公文翻译的讨论文章，金花、斯勒哈、乌力吉巴雅尔、哈旦夫等关于新闻、广播翻译的讨论文章，对于提高行政部门和宣传部门的翻译业务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互接触、相互影响，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变得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更普遍，也更引人注目。它向语言学家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饶有兴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人们从历史的和现实的比较研究中力图探索其中的规律。确精扎布研究新疆突厥语族语言和蒙

古语的相互影响,写了《试论库库门恰克语中的蒙语借词》(内蒙古大学学报,1981,2)、《库库门恰克语语音结构与蒙古语语音》(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4)、《从库库门恰克语与蒙古语元音比较看蒙古语语音史的一些问题》(《民族语文》,1985,2)。和希格、巴达荣嘎、沃彩金、塔娜研究蒙古语和满洲通古斯语族语言之间的接触,分别写了《论蒙古语、满语书面语的比较》(《蒙古语言文学》,1981,4)、《达斡尔语、满洲语、蒙古语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2,2)、《关于蒙古语、达斡尔语、鄂温克语动词时态的表达》(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4,2)、《试论汉语对达斡尔语的影响》(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3—4)。普日布吉写了《蒙古语、维吾尔语的某些附加成分和词的比较》(《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2)。陈乃雄就多种语言成分杂呈的“河西译语”语言以及在受藏语、保安语强烈影响的汉语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五屯话里的特殊现象写了《〈河西译语〉里的阿尔泰语言成分》(《中国语言学报》创刊号)和《五屯话初探》^①(《民族语文》,1982,1)。哈斯额尔敦、蒙文专科学校的教师们则针对蒙汉族人民间相互学习彼此语言交流思想的需要,编著了《汉蒙语法比较》、《蒙汉对照语法》这样具有很大实用价值的工具书。

为了帮助汉族干部、群众学习掌握蒙语蒙文,内蒙古语委、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等编写出版各种蒙古语自学读本、广播会话教材;陈乃雄从六十年代起陆续编著了《蒙文初程》、《蒙文入门》^②等课本,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蒙古民族除了现行的文字外,历史上还曾使用过其他形式的文字,如最早的回鹘式文字和忽必烈时代的八思巴文字等。要想全面了解蒙古文字和文化的历史概貌,不能不对过去使用过的不同文字进行深入的发掘和研究。包祥的《蒙古文字学》(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4)、包力高的《蒙古文字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就是系统地介绍蒙古族在各个历史时期使用过的文字的著述。包祥等学者还提出了蒙古文字的创制早于十三世纪的设想。对于回鹘式蒙古文的研究成果,有亦邻真的《回鹘式蒙古文与古代蒙古语语音》(内蒙古大学学报,1976—1978),敖力布的《关于(成吉思汗碑铭)的研究》(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1,1),哈斯额尔敦的《紫微宫蒙古文碑文考》(《蒙古语文》,1984,2),道布、包祥等关于“云南王藏经碑”的考释文章(《中国社会科学》,1981,3;《民族语文》,1980,4)等。道布整理、转写、注释的《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民族出版社,1983)是迄今搜集资料最全、注释最详的一部汇编。它已成了研究回鹘式蒙古文不可缺少的参考书。对于八思巴字的研究成果,有照那斯图的《论八思巴字》(《民族语文》,1980,1)、《八思巴字篆体字母研究》(《中国语文》,1980,4)、《南华寺藏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的复原和考释》(《中国语言学报》创刊号)、《关于玄中寺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碑刻》(《民族语文》,1986,6),照那斯图和杨耐思合撰的《八思巴字研究概述》(《民族语文》,1981,1),照那斯图和道布合撰的《天宝宫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碑》(《民族语文》,1984,6)以及郝苏民的《对西藏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圆牌的译释兼论其意义》(西北民族

^① 编者按:陈乃雄的《五屯话初探》发表后,深受国内外语言学界的关注与好评,成为公认的“典型的混和语”被引用。《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摘要转载。

^② 应该指出,用汉文编著解释蒙古语语法、蒙文,循序渐进,体例科学,这是陈乃雄教授为蒙汉两民族的文化交流的又一贡献,受到著名蒙古史学家翁独健、蒙古语言学家清格尔泰以及美国、日本学者的好评,——编者。

学院学报, 1979, 1)、《元代圆牌之八思巴文及波斯文考释》(《蒙古语文》, 1985, 1), 张卫东的《试论八思巴字的冠 h 韵母》(《民族语文》, 1983, 6)、陈乃雄的《〈蒙古字韵〉和元代钱币八思巴字释读》(《内蒙古金融·钱币增刊》, 1985)、双胡尔的《关于八思巴字》(《蒙古语文》, 1984, 2)。还有呼格吉勒图关于八思巴字母“e”与“è”, 昂儒布关于八思巴字母“·”等的讨论文章。照那斯图的《论八思巴字》集中反映了他在这一领域里的研究成果。作者对八思巴字字母表问题提出了“原字母表”和“总字母表”的概念。在八思巴字字母数目方面, 多年以来人们的看法极不一致, 他的研究作为廓清混乱, 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探索了一条新路。文章还论证了八思巴字母的表音单位不是音节而是音素, 因而八思巴字在类型上不是音节文字而应属于音素文字; 八思巴字有零声母符号系统, 其中包括若干字母和一个书写符号(字头符), 还有一个连接书写单位的专门符号(连接符)。这些新见解实际上是对八思巴字内部体系的重新勾画, 是揭示八思巴字体系内在规律的有意义的尝试。照那斯图对八思巴字研究有很深的造诣, 他所搜集的八思巴文献资料是迄今最全的, 对八思巴字演变来的篆体字的释读令人信服。广东曲江南华寺藏有裱装本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一卷, 含两道护寺的圣旨, 由于原件曾断成数截, 且有一部分残损, 装裱时把两个文件揉合在一起, 行款次序错乱, 文义不通。照那斯图把这两件文书进行复原、考订出文献的年代、转写并译出原文, 最后加以注释与考证, 受到学术界好评。郝苏民在从事八思巴字资料研究考释的同时, 还把鲍培的《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一书译成汉文, 即将由内蒙古文化出版社精印出版。

现代蒙古语言和蒙古文字之间的脱节现象一直是蒙古语文工作者努力研究希图解决的一个难题。1962年内蒙古自治区决定蒙古文字不改革, 采取相对稳定的政策, 继续使用现行蒙文。于是改革文字的任务就被改进文字的任务所代替。近年来关于改进现行蒙文正字法的讨论非常热烈。出版的专著有布和吉日嘎拉的《蒙文正字法简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5) 吉林人民出版社的《蒙文正字法小词典(试用本)》(1978)、布林特古斯的《蒙语正音正字词典》(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1979)、普日布的《蒙文正字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0)等。布和吉日嘎拉还根据本人从事教学三十多年过程中遇到的与正字法有关的一些问题, 参考有关论著, 写成《改进正字规则, 规范书写法》(《内蒙古社会科学》, 1983, 4)一文。这篇文章首先介绍了正字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其次谈了正字法和正字法原则, 最后就词根的规范、构词附加成分的规范和违反正字法的写法的规范提出了具体意见。新特克和诺尔金就正字法问题写过许多文章, 发表过许多有价值的意见。他们的有些意见已被采纳。

七十年代, 新疆的蒙古族人民为了便于同其他省区的蒙古族人民交流, 大大加强对“胡都木蒙文”(新疆地区以外使用着的我国现行蒙古文)的学习推广, 提出了“统一蒙古文字”的目标。1983年第2期《新疆蒙古语文》上发表巴岱的《统一文字是发展文化的需要》、赛音宝勒格的《为加速民族文字的统一而贡献力量》等文章。同期和后来的《新疆蒙古语文》以及其他刊物、学报上陆续发表介绍托忒蒙文和帮助新疆蒙族掌握“胡都木蒙文”的文章。诸如杜戈的《论胡都木蒙古文》, 新疆人民出版社于1976年和1979年出版了《蒙文和托忒蒙文》、《蒙文和托忒蒙文对照蒙语辞典》等专门的工具书。

深入探索蒙古语发展史的任务, 向学者们提出了进一步加强研究蒙古语文献资料和蒙古语亲属语言的要求。关于《蒙古秘史》, 已经出版了不少专著, 其中有额尔登泰、乌云达资、阿萨拉图、道润梯步、巴雅尔、满仓等人注译的各种《蒙古秘史》及其“词汇选释”。单

篇文章则有喻世长、确精扎布、恩和巴图、哈斯巴特尔、孟和宝音、天峰等所写的关于这部重要文献的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的论述。由于在语言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的通力协作下利用电脑处理蒙古语信息的试验已经成功，目前中世纪蒙古文文献已大都输入电脑，按照编定的程序向研究者提供服务。官其格苏荣、呼格吉勒图、斯钦朝克图、白俊瑞、图们其其格、白音门德、哈斯巴根、呼日勒巴特尔、山普力等就主要以《蒙古秘史》语言为代表的中世纪蒙古语的语音和语法问题撰写过很有分量的论文。其中白俊瑞的《中世纪蒙古语动词祈使式形态及其演变》引起日本著名蒙古语学者小泽重男教授的重视，认为文章中提出了一些很有启发性的见解。另外，像哈斯额尔敦、巴根、双胡尔对于《华夷译语》的研究，照那斯图、哈斯额尔敦、仁钦嘎瓦、斯钦朝克图对于《孝经》蒙译的研究，齐达拉图对于《蒙古源流》文字的研究，道斯来扎布对于《青史》语言的研究，都为建设蒙古语言史这门学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80年，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和研究生分成七个小组按照新编的统一大纲，重新对蒙古语族诸语言以及蒙古语卫拉特方言和巴尔虎——布里亚特方言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调查。研究生以这些调查资料为依据分别撰写了各自的毕业论文。其中《蒙古语族语言基本元音的比较》（呼格吉勒图）、《关于蒙古语族诸语言的长元音和复合元音》（包力高）、《蒙古语族语言辅音比较》（森格）、《关于蒙古语族诸语言格的范畴》（哈斯巴特尔）、《关于蒙古语族诸语言人称代词的几个问题》（斌巴）、《关于蒙古语族诸语言的副动词》（乐·赛音额尔敦）、《蒙古语族语言动词态诸形态的比较》（包·吉仁尼格）、

《关于蒙古语族语言几个后置词起源的探索》（季荣），集中刊登在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上。在此同时，民族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照那斯图的《土族语简志》、《东部裕固语简志》，刘照雄的《东乡语简志》，布和、刘照雄的《保安语简志》，仲素纯的《达斡尔语简志》，道布的《蒙古语简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拿木四来和哈斯额尔敦合著的《蒙古语和达斡尔语比较研究》。在蒙古语族语言的综合研究方面则发表过喻世长所著我国第一本论述蒙古语族诸语言的专著《论蒙古语族的形成和发展》

（民族出版社，1983），清格尔泰的《关于蒙古语族语言及其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1985，4），拿木四来的《蒙古语族语言人称代词的比较研究》（《蒙古语文》，1982，6；1983，1—2），陈乃雄的《中国蒙古语族语言的构词附加成分》（内蒙古大学学报，1985，4）、《蒙古亲属语言的祈使式动词》（《民族语文研究文集》，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刘照雄的《浅谈蒙古语族中动词的特点及句法功能》（《语言研究》，1982，2）、《我国蒙古语族语言的语音对应》（《民族语文》，1984，6），王鹏林的《关于蒙古语族“格附加成分”的问题》（《民族语文》，1983，1）、《蒙古语族的“宾格附加成分”考察》（内蒙古师大学报，1983，4），呼和巴尔的《蒙古语族语言复数附加成分的比较及其起源的探索》（内蒙古师大学报，1984，3）、《蒙古语族语言名词的人称领属形式》（《蒙古语言文学》，1986，5）等。至于对个别语言研究的成果方面，尚有孙竹、仲素纯、恩和巴图、乌珠尔、达兰泰、门都等人关于达斡尔语的论著，那森巴雅尔、孙竹、刘照雄、布和、那德木德、包力高、呼和巴尔、阿·伊布拉黑麦等人关于东乡语的论著，清格尔泰、照那斯图、李克郁、席元麟、季荣等人关于土族语的论著，陈乃雄、刘照雄、布和、乐·赛音额尔敦等人关于保安语的论著，照那斯图、保朝鲁、贾拉森、格日勒图等人关于东部裕固语的论著。一套包括词汇、话语材料和同蒙古语进行比较研究等内容的《蒙古语族语言方言研

究丛书》正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分卷出版。其中有九本已经发行，七本即将出版，另外五本即将发稿。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栗林均读了已出版的部分分册后认为：“这套蒙古语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的公开发行，使包括中国国内孤立的蒙古语族诸语言在内的蒙古语族语言进入了可以进行真正的历史比较研究的新阶段。”这是“在蒙古语研究史中应当特别予以记载的业绩”。（《（东乡语词汇蒙古文语索引）序》）。

契丹是我国古代的一个北方民族，学者们都认为契丹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结合蒙古语发展史的研究，近年来对契丹语言文字的研究不断深入。1975年起，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五人合作研究契丹文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于1977年发表了《关于契丹小字研究》。这篇论文被日本著名学者、京都大学的西田龙雄教授评价为“划时代的新研究”，认为“契丹文字的解读已经达到了用确实的根据给予特定的原字以一定的音值的阶段。应该说这是应给予高度评价的成果”。以此文的发表为契机，契丹文字学界又出现了一股求索的热潮。短短十年时间里，各种刊物先后发表了近百篇有关文章。这在契丹文字研究史上是空前的。1985年《契丹小字研究》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本书包括“契丹小字研究总论”、“契丹小字资料总编”两编。“契丹小字研究总论”由“契丹小字概述”、“契丹小字研究概况”、“我们对契丹小字开展的新研究”、“契丹小字字形规范”四章组成；“契丹小字资料总编”由“契丹小字金石资料拓本和照片”、“契丹小字资料的整理和释义”、“契丹小字文献解题”、“原字索引”四章组成。

四十年来我国蒙古语族语言的研究逐步得到发展，由比较单纯的语音、语法、词汇研究，扩展到语言科学的各个分支学科。研究的水平不断提高，某些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令国内外学术界瞩目的成果。

（上接79页）

元音 + 辅音，如：am “嘴”，əm “药”；

元音 + 辅音 + 辅音，如：alt “金”；

辅音 + 元音，如：bi “我”，ji “你”；

辅音 + 元音 + 辅音，如：nar “太阳”；

辅音 + 元音 + 辅音 + 辅音，如：dard “摇车”，dald “顶针”。

语法简介

1. 词类：达斡尔语的词可分为名词、形容词、数词、代词、时位词、动词、副词、后置词、连词、语气词、象声词（摹拟词）、感叹词等12类。

2. 句子成分：有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5种。语序一般是主语在前，宾语居中，谓语在句末，定语和状语在所修饰和限定语之前。

3. 名词的复数附加成分有 -nur、-sul。但对一般动物很少用 -nur、-sul，只用

bara:n “多”这一限定词来表达，如 bar-ra:n xukur “很多牛”；或用 manj “群”表示，如 nek manj dzur “一群鹰子”。

4. 名词的格：

主格，词的原形。

领—宾格，后缀有 -i、-i:、-yi。

位—与格，后缀 -d。

从格，后缀 -a:s、-e:s、-o:s、-e:s、-ja:s、-je:s。

造格，后缀 -a:r、-e:r、-o:r、-e:r。

共同格，后缀 -ti。

程度格，后缀 -tja:r、-tje:r。

5. 动词的式：

（1）陈述式：陈述式动词的现在将来时附加成分有 -bæi、-n，以前者为常用。过去时附加成分有 -sæn、-la，后者较为少用。

（2）祈使式：第一人称 -ja:、第二人称 -dæ:、第三人称 -tgoi。